

# 卫三畏与《中国总论》

陈佳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撰写的一部介绍晚清中国社会全貌的综合性著作, 共有 1848 年和 1883 年两个版本。作者主要为“试图洗刷掉外国人眼中可笑的中国人形象”、“增进基督教传教福音”以及“返乡演讲之契机”此三因素撰写此书, 又因修订此书具有较好的条件和现实意义等原因再版(1883)。将两个版本进行比对, 可分析再版(1883)补充修订的情况。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两个版本在出版后都有极好的社会反响, 有其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影响。

**关键词:** 卫三畏; 《中国总论》; 两个版本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卫三畏(1812—1884), 美国第一批来华传教士, 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其最能体现汉学成就的莫过于《中国总论》。此书于 1848 年刊行初版, 后在 1883 年进行再版, 是为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及社会的重要的门径。初版(1848)作为美国第一部撰述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 其在何种原因下创生, 时隔三十五年为何再版, 再版(1883)的内容相比初版(1848)有哪些明显的补充修订, 以及卫三畏《中国总论》出版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都是本文待以考察的问题。

## 一、初版(1848)《中国总论》成书原因探析

1848 年卫三畏《中国总论》出版前, 美国人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关于其为何要写此书, 他在《中国总论》的序中, 明确表达了撰写该书的动机。

其一, 卫三畏“要为中国人及其文明洗刷掉通常加予他们的那些奇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形象。”<sup>[1]</sup>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好奇和幻想之中。美国商人虽然早在 18 世纪末就来到中国, 但因中国政府的限制、语言的不通、自身对中国了解兴趣不强等原因, 商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更不消说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认知。18 世纪中叶欧洲对中国的否定、传入中国的商品以及极少部分亲临中国的美国人的印象构成了美国人早期对中国认识的基础。这些印象使他们“马上自以为是地、无知地、几乎毫无新意地”认为“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是一群无趣的、奇异的和未开化的‘猪眼的’人民, 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嘲笑他们”“这是个‘撑着雨伞的民族’, ‘长尾巴的天朝人’”中国人是“自负、无知、几乎不可救药”为此, 他希望通过此书“传播有关中国更公正的知识”以纠正外国人眼中对中国的偏见认知。

其二, 卫三畏力图“增进基督教会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的兴趣”。

19 世纪, 美国的经济逐渐发展, 国力逐渐增强, 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日渐深远, 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教热潮。卫三畏作为一名传教士, 在美国传统文化熏陶、基督教的使命感、早期中美贸易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 其选择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 “一个念头刺激着我一生从事这一工作, 它就是这样一种希望—传教事业能够发展起来。在这个事业的成功中蕴藏着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给予其拯救, 既在道德方面, 也在政治方面”<sup>[2]</sup>

而美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现实，又使得鼓动民间力量支持宗教事业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他决定撰写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的书籍“希望此书来推动在华传教事业，希望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使在华传教事业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sup>[3]</sup>他在1846年3月致母亲信中说：“我希望我所谈到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况，能在我的听众心中激起一些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同情，而不是仅仅满足他们的好奇心。”<sup>[4]</sup>并在1847年8月给当时的未婚妻子沃尔沃斯小姐的信中也谈到“我相信促使我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动机是正确的。我的动机之一就是使我的教友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命运。我想向人们表明：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宣讲我们的教义。”可知，卫三畏写该著作首要是为了让国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关注和支持，是呼吁更多的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福音。

### 其三，返乡演讲之契机

卫三畏在广州、澳门住了12年后，曾于1845年回到美国。为了传教的需要，返美过程中他计划购买一套中文金属活字。但其需资金巨大，即便有长老会资金的资助、家乡马丁夫人的筹款，依然有较大的缺口。因此，卫三畏开始在尤蒂卡、克利夫兰、布法罗、纽约等城市和乡村做有关中国社会现状的系列演讲。当时美国正值对中国进行扩大投资，因此美国社会内出现“中国热”，加上卫三畏在华12年的亲身经历等原因，卫三畏的演讲受到美国民众的极大追捧，反响热烈。一年时间里，卫三畏的演讲多达上百次，在他演讲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料的整理，他也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加之演讲时积累下来的资料，促使他下定决心撰写一部能反映中国社会全貌的综合性普及性的书籍。

1833年10月卫三畏抵达广州，距离其出版初本《中国总论》有15年的时间。作为美国来华的第一批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的阅历和见闻此时应该说是美国人中间少有的。为洗刷外国人眼中对中国人的可笑印象、增进基督教的传播福音、以及返乡演讲的直接契机，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 二、再版原因及两版本对比探析

修订《中国总论》的想法产生于1876年卫三畏辞去外交职务之后。当时此书已出版近30年，为修正此前写作中信息编写的失误以及完善信息，卫三畏晚年决定修订此书，以使本书的编写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情况。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限制了卫三畏完成整本书修订的心愿，他在完成对原有章节的修订之后，由其儿子卫斐烈完成了新版最后三章的撰写以及修订余下的工作。1883年10月，新版《中国总论》终问世。

### （一）再版原因

卫三畏为何要编写该书，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再版具有较好的条件和现实意义。初版（1848）《中国总论》一经出版后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一直有着稳定的销量，不仅如此，此书还为卫三畏带来了荣誉，使他从一位汉学初学者变成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由于（中国总论）已经成为当时这个领域的权威，卫三畏决心通过修订使作品与它的

声名相符合。在出版商及时地宣布新版本即将问世之后，还有一些人继续购买旧版本，这一事实或可说明人们对这样一本书的持久和迫切的需求。”显然，卫三畏希望通过再版扩大此书的影响力。又中国在这三十多年中社会也经历了大变局，同样意味着修订工作具有意义；其次，卫三畏与中国及国人有长期联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其论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时日最长的人，卫三畏在华自然接触了不少中国人。在他做外交官时，与耆英、李鸿章等中国官员多有交往，《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等他是直接参与者，再版（1883）写作前他还亲历见证了皇帝的活动；再次，汉学研究在当时已有更多新的成果，可为修订的参照。据姜源对 1883 年版本的统计，“书中对乔治·斯当东德引用和提及有 9 次；对巴罗的引用和提及达 15 次；对德庇时的引用和提及更高达 47 次之多”<sup>[5]</sup>。最后，《中国丛报》的现成资料为《中国总论》提供了的重要信息。《中国丛报》是美国人创办的首部研究中国的杂志，卫三畏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成果很多发表在《中国丛报》上。初版（1848）的写作有大量资料源于《中国丛报》，而这些撰述也有很多保留在再版（1883）中，《中国丛报》是为《中国总论》的重要资料来源。

由上可知，较好的条件和现实意义、亲身参与中国社会的体验、汉学研究新的成果以及《中国丛报》大量资料的基础等构成了卫三畏再版此作的条件。

## （二）两个版本之对比分析

《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1848 版内容篇幅有 1200 多页，1883 版则有 1600 多页。两版全书各分 23 章和 26 章，除新增的最后三章内容，其他章节不变。其主体章节有：中国区划及特征、东部各省地理情况、西部各省地理情况、满洲、蒙古、伊犁、西藏地域地理情况、人口和数据统计、中国的博物志、中国法律和政府概略、法律的执行、教育与科举考试、中国语言文字结构、中国经典文献、中国的雅文学、中国人的建筑、服装与饮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工艺、中国人的科学、中国的历史与纪年、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中国的商业、中国的对外交往、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两个版本显著差异如下：

### 其一、两版《中国总论》中所附之地图及插图对比

初版《中国总论》中卫三畏在第一卷中附了一张地图，书名副标题为“附一幅帝国新地图”。此地图的刻工为家雅各布·威尔斯·奥尔。该地图主要参考了已有的中外大量资料绘制而成，据卫三畏自己谈这幅地图约 90 平方英尺，不仅绘制了中国的十八省，还划定了蒙古、满洲和伊犁的边界线、注明了日本部分的县和藩、西藏、安南部分、俄国、准噶尔、土耳其斯坦部分等。但由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未开放，因此长城以北地图的绘制，他自己承认所根据资料不足。1883 版《中国总论》也附了一幅地图，名称为“中华帝国地图”。再版（1883）的制版刻工是埃特伍德，地图在初版（1848）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订。与 1848 版相比，1883 版地图缩小了比例，但更为精确地划定了疆界：东起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至海南岛，北至外兴安岭、补充了中亚地区的详细地图，标注了日本海。

为了更加客观及形象表现中国社会的面貌，作者还特意在两个版本中添加了大量插图。这些插图均取材于西方人著作，后经卫三畏分门别类添加了进来。据有关资料显示，1848年版插图共39幅，1883年版共72幅，新版比初版插图多了将近一倍，其内容包括北京的天坛、北京的安定门、北京的孔庙、北京的贡院、北京的辟雍宫、宁波的妈祖庙、长江上的峡谷、苗族的人像等等，选取的这些插图几乎也都是卫三畏在中国所见之场景。

## 其二、内容之比对

副标题的变化。初版（1848）副标题为“概览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等”，再版（1883）副标题则是“概览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等”。细微的变化可看出再版（1883）更重视叙述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情况。

就具体章节来看，再版（1883）较之初版（1848）做了如下明显补充修订：

第一章中，再版（1883）对中国国土面积内容修改较多，增加了中国割让英国、俄国领土的情况；对长城的撰述由初版（1848）引用他人的游记到再版（1883）自己亲身体验后之叙述；再版（1883）删去了初版（1848）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如将描述满族湖泊时所讲的满族神话删除，将初版（1848）引用《圣经·以赛亚书》“希尼之地”就是“中国”的观点删除等；第二章里，再版（1883）主要对某些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补充修订。如谈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对江苏地区的影响，太平军毁坏南京大报恩塔的事件，补充了上海发展的历史并对初版（1848）中对台湾叙述怪异的描述做了全面修改等；第三章增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割让九龙半岛的情况，更新了当地人的口数字，在介绍广州十三行时，再版（1883）又删去了大量关于十三行分布的情况；第四章增加了京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贸易的变化，更新了满洲边界，删去了对库页岛的大段描述、删除了初版（1848）介绍西藏西北地区将近一页的文字；第六章因博物学家在此方面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因此在博物志的动植物知识方面卫三畏做了较大的改动，如再版（1883）除介绍《本草纲目》外，增加了1848年吴其浚《植物名实考》的信息；第七章在谈到中国皇帝时，增加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内容，补充了1860年外国人所见中国监狱的见闻，谈到八旗兵时，删去初版（1848）错误的记载，认为八旗是满蒙汉三族组成的世袭的八个兵团；第八章谈到林则徐和耆英时，补充了初版（1848）以后发生的事情；第九章谈到科举考试时，再版（1883）补充了咸丰年间科举舞弊案件。第十章在谈到外国人制造中文活字的努力过程，再版（1883）增补了19世纪50年代贡献，补充了初版（1848）以后新教传教士对福州、汕头、广州三种方言的调查等；第十一章1848版有关孔子生平事迹介绍部分在孟子介绍之后，而再版（1883）将孟子放在后面等；第十二章研究中国诗歌，补充了德庇时等汉学家在19世纪末的大量专述的内容；第十五章在描写瓷器的工艺时，补充了儒莲1856年关于景德镇瓷器制造的资料；第十六章谈到中国的军队时主要补充了一段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常胜军首领戈登对中国军队的评论；第十七章在叙述清代历史时，补充了道光末年、咸丰、同治、光绪初年的历史，直至1881年；第十八章谈到



丧葬问题时，补充 1875 年同治皇帝葬礼的情形，中国与穆斯林在回乱期间斗争的问题以及丁匙良 1866 年到开封调查犹太后裔的情况等；第十九章主要续写了 1848 年版后新教在华传教史转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译文，初版（1848）采用的是 1845 年裨治文的译文，再版（1883）改而采用传教士伟烈亚力 1855 年新发表的译文。体现出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行学术研究的新进展；第二十章补充了 1858 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的中国鸦片蔓延的详细情况，指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恶劣后果。关于外贸分类的内容中将好望角路线改为苏伊士运河，补充了 1860 年以来对外贸易增加的进出口品种；第二十一章补充了很多欧洲汉学家的著作和西方旅行家的记述；在谈到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时补充了 1848 年后的条约情况。新增加的三章为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最近的事件，这一部分的内容现实问题性很强，近代中国的面貌展现地淋漓尽致。

由上述可知，再版（1883）《中国总论》较之初版（1848）在地图、插图以及内容上都有明显的改动。

### 三、《中国总论》的影响

其一，对“洗刷外国人眼中可笑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播基督福音”的积极作用

卫三畏在初版序言中表明了自己写作动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竭力纠正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并在书中对中国文明某些方面给予了肯定，他说：“中国人在生产总的方面，在家庭生活的艺术和群众的舒适方面，比曾经存在的任何异教或伊斯兰教国家，或比有些自称耶稣教的国家达到更高的地位。”<sup>[6]</sup>他对儒家经典进行肯定：“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则超过了西方的哲人。”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认知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当今学者对此作品评价到：“很难再找到一本象《中国总论》这样的书，为了异族的幸福，以那样的语言，展示了一个辉煌、可敬的文明和它具有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这些篇章所刻画出的诚实和博爱，将告诉未来的读者，它的作者热爱并研究这个民族，让后代记住作者对他们抱有的希望。”<sup>[7]</sup>关于增进“传播基督福音”的这一点，卫三畏自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没有停止过此念想，而在文中也随处可见他这一观念。据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很少，长期生活在广州（澳门的只有裨治文、卫三畏、伯驾、史第芬 4 人。1842 年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到 1850 年已经达到 88 人，1877 年新教入华 70 周年（是年召开第一次新教大会）时则达到 210 人。传教士的增多，使得卫三畏“传播基督福音”的写作目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其二、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相比欧洲汉学，美国汉学研究较晚，且一开始就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正是一部关于叙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在书中他不仅叙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且对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见他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费正清曾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sup>[8]</sup>马森曾对此书称颂道“也

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sup>[9]</sup>卫三畏也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中，在1876年回到美国后，他接受耶鲁大学聘请他为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的荣誉，而后在他的主持下，耶鲁大学又建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美国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中文课程，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也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1881年，任职耶鲁大学的畏三畏担任了美国东方学会主席，而后汉学研究机构在美国陆续成立：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亚洲协会等。在卫三畏的带领之下，美国汉学研究逐渐兴起，开创了美国汉学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的路径。

### 其三、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以自我为“中心”，将周边国家视为“四夷”，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认知甚少。来华传教士的到来丰富了中国人的见闻，中国人通过与以卫三畏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和来华贸易之商人进行接触以及通过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对西方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中国总论》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对当时的中国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使中国人对自己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体会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为当时的国人敲响了警钟。而徐继畲《瀛环志略》和魏源《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的资料大多引用此书，该书也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 其四、消极影响

卫三畏作为美国汉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其开展的文化活动其本质上是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工具，他对待中国也是以传教士的眼光来对待的，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如在《中国总论》中他一方面对儒家思想进行称颂，指出“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四书五经的实质与其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興味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儒家经典比不上西方《圣经》，他说“这些书所造成的势力，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他对儒家学说及其影响的肯定是为了强调必须利用儒家经典推广在华传教事业；而为了突出基督教的优越性，他过分渲染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认为只有靠福音能够拯救他们。他指出：“中国人表现为一个混合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赞扬，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批评”他提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日趋混乱，鸦片和国民道德的沦丧正使整个民族日趋堕落。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他们”。虽然卫三畏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持否定态度并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传教，但他又认为中国人太过于愚昧无知，因此建议“如果西方四强抛弃对彼此的怀疑，联合起来，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与西方各国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交流，那么建立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为中

国找到了最可靠的安全保障。”他认为只有通过战争和暴力才能让中国人学会平等地对待外国人，才能把福音传播到中国，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由上可知，卫三畏带有西方观念意识的情感偏向对人们正确认知中国是不利的。

#### 四、结语

《中国总论》的出版，与卫三畏长时期居住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其传播基督教的热情、返乡演讲之直接契机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隔三十五年，中国社会已然发生巨变，因再版（1883）已具备较好的条件和现实意义、卫三畏在中国活动范围的扩大及接触各阶层人员的增多、《中国丛报》拥有充足资料等条件因素，此书于1883年10月重版。不管是初版（1848）《中国总论》，还是再版（1883）中国总论，其内容所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性都是较同期作品更佳的。作为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所体现的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关注也为此前著作中没有的，这对美国汉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先进的中国人汲取教训救国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作为一名基督教的狂爱追随者，卫三畏难免会以基督教普世观看待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这一点有失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总的说来，此书出版的意义更大。

#### 参考文献

- [1] 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9.
- [3] 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4] (美)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5] 艾萍：《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中国学研究》，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 [6] (美)丹特涅著，姚广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8年。
- [7]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1884年，纽约，第47—48页。转引自顾卫民《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第74页。
- [8]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 [9]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 Wells Williams and an overview of China

Chen Jiali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a, written by wei sanwei in 1848 and 1883, is a comprehensive work introducing the whole pi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mainly wrote this book for the three factors of "trying to wash away the ridiculous image of Chinese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improving the Christian mission Gospel" and "the opportunity of returning home to make a speech", and republished this book for reasons of good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1883).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editions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supplementary revisions to the reissue (1883). Both versions of wei sanwei'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a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society after their publication, with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Keywords:** Wells Williams;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a;The two versions

**作者简介:**陈佳莉（1994—），女，四川遂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